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二）

冯达文自选集

冯达文◎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二）

冯达文自选集

冯达文◎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冯达文自选集 / 冯达文著. —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7. 11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 系列二)
ISBN 978 - 7 - 306 - 06142 - 3

I. ①冯… II. ①冯… III. ①哲学—中国—文集 IV. ①B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7697 号

出 版 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陈 芳

封面设计: 曾 斌

版式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高 洵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1997, 84113349,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21.25 印张 359 千字

版次印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0.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二）

编 委 会

主 任 慎海雄

副主任 蒋 斌 王 晓 宋珊萍

委 员 林有能 丁晋清 徐 劲

魏安雄 姜 波 嵇春霞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二）

出版说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兴盛指明了方向。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思想武器，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是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改革开放近4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广东要实现“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的目标更需要充分调动与发挥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明确提出要打造“理论粤军”、建设学术强省，提升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形象和影响力。这次出版的“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就是广东社科界领军人物代表性成果的集中展现，是广东打造“理论粤军”、建设学术强省的一项重要工程。

这次入选“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的作者，均为广东省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家。2014年7月，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启动“广东省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家”评选活动。经过严格的评审，于2015年评选出广东省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家10人。他们分别是（以姓氏笔画为序）：王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毛蕴诗（中山大学）、冯达文（中山大学）、胡经之（深圳大学）、桑兵（中山大学）、徐真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黄修己(中山大学)、蒋述卓(暨南大学)、曾宪通(中山大学)、戴伟华(华南师范大学)。这些优秀社会科学家是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和学术标杆。为进一步宣传、推介我省优秀社会科学家,充分发挥他们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兴盛,根据省委宣传部打造“理论粤军”系列工程的工作安排,我们决定在推出“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一)的基础上,继续编选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家的自选集。

本文库自选集编选的原则是:(1)尽量收集作者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专著中的章节尽量少收。(2)书前有作者的“学术自传”,叙述学术经历,分享治学经验;书末附“作者主要著述目录”。(3)为尊重历史,所收文章原则上不做修改,尽量保持原貌。(4)每本自选集控制在30万字左右。我们希望,本文库能够让读者比较方便地进入这些当代岭南学术名家的思想世界,领略其学术精华,了解其治学方法,感受其思想魅力。

10位优秀社会科学家中,有的年事已高,有的工作繁忙,但对编选工作都高度重视。他们亲自编选,亲自校对,并对全书做最后的审订。他们认真严谨、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学风,令人肃然起敬。

在编辑出版过程中,除了10位优秀社会科学家外,我们还得到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深圳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每三年评选一次。“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将按照“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要

求，陆续推出每一届优秀社会科学家的自选集，把这些珍贵的学术精华结集出版，使广东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之薪火燃烧得更旺、烛照得更远。我们希望，本文库的出版能为打造“理论粤军”、建设学术强省做出积极的贡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广东的哲学社会科学一定能迈上新台阶。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编委会
2017年11月

目录

学术自传 / 1

第一部分

论史探寻

旧话重提：理性与信仰 / 45

理性的界限

——先秦两汉思想转型提供的启示 / 57

在“天”与“人”、信仰与理性之间

——再论先秦两汉思想转型提供的启示 / 72

第二部分

儒道纵横

重评中国古典哲学的宇宙论 / 95

借宇宙论确立的儒道两家之“生命的学问” / 116

儒家系统的宇宙论及其变迁

——董仲舒、张载、戴震之比较研究 / 134

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和儒学的三种本体论取向 / 158

个人·社群·自然

——为回归古典儒学提供一个说法 / 189

道家哲学的本源—本体论 / 206

道家哲学的人生智慧 / 227

《淮南子》：道家式的“内圣外王”论 / 235

现代新道家之成立论

——兼评新儒家作为意识形态追求的“外王”学 / 251

第三部分

岭表源流

禅宗诸家之“心性”说

——从初祖菩提达摩、六祖惠能到洪州马祖道一之思想变迁 / 261

禅道汇通的观念建构与境界追求 / 277

“情”的唤醒

——论白沙心学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 294

湛甘泉“随处体认天理”说的哲学含蕴 / 312

附录 冯达文主要著述目录 / 323

后记 / 325

走在学思的路途上

人生诚如“白驹之过隙”（庄子语），许多事情感觉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被从教45年”，且预贺七十大寿了。

几十年前，一个乡村的穷孩子不去选择一些脚踏实地的行当，而好高骛远地以在当时少有闻及，即便闻及也被认作故弄玄虚的哲学为终身事业，现在想来也不禁有唏嘘之叹！

一、纯真岁月

广东罗定（今罗定市）在明代虽已为直隶州，但天地宇宙把它圈为山区至今无法改变。1949年以前，许多人要跑到梧州去谋生。我就出生于这个山区县的一个小镇里。那是1941年，抗日战争正进入最为艰苦的时期。家乡似乎并没有直接为日寇所蹂躏，但是直至中年还经常梦到被带着逃往深山迷路的险恶情形。1949年年底，广东解放，不久父亲却不幸病逝，母亲拉扯着三个小孩，生活之艰苦不难想象。

记得幼小的时候是姐姐带着我上蒙学的。学校设在一个庙堂里，不知是古典乡村的遗风——庙堂承担着敬神与教化的双重功能，还是近代破除迷信的产物——把宗教场所改设为学校。大概蒙学读了一年，即遇时代变迁。不久转入公设学校，似乎一下子就上三年级，再一跳又是五年级。因为学制的无序，数学考试常常得0分。六年级读了三次，才得以入读罗定一中。及至初中，不知怎样地脑子开窍了，数学、物理经常考第一。初中毕业，轻易地考上罗定中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所中学曾为广东

省立第八中学，小有名气。

那时候年纪小，一颗纯真、质朴的心灵，并未感受到大社会的风风雨雨，只想着要努力地去学习，尽快地去成长，将来尽可能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贡献。中学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初中时要从家里挑着米菜走40里路到城里自己做饭吃；高中二、三年级供应的粮食一个月22斤，只好一天吃两顿。然而，中学的生活却又是最活泼、最无邪、最富于幻想与最具可塑性的。白天经常到大街上做各种文艺宣传活动，晚上则到附近乡村教人读书识字；“大跃进”时热火朝天地投入土法炼钢运动，尽管还是把钢铁炼成渣滓；又曾尝试去做从厕所里收集沼气以做燃料的实验，以及到山村学习造纸技术以图寻找半工半读的道路；……进入高三，得回到课桌前准备高考了。但是，因为那时高中毕业已算得上是知识分子，考不上大学会安排工作，所以同学们并没有过分的焦虑。

哲学家苏格拉底说，不懂得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我大概是不太会反省的一类人，所以虽然致力于哲学史，终无法成为哲学家。不过，过分的反省会使人变得郁闷与沉重，所以不做哲学家也罢！在往后的岁月里，不管遇到什么挫折，心里总是怀有一分激情，抱有一线希望，这大概还得感激中学时期的馈赠！

二、热血青年

1960年夏，我高中毕业，收到的录取通知书为“留苏预备生”。10月初，我告别家乡，准备北上。首站来到广东省高等教育局，才知道苏联去不成了，让我在本省选一个学校与专业。于是，我入读中山大学哲学系，从此与哲学再也无法分离。

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口号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的数理化并不差，却何以不去选择一些热门的学科，而去读一个对当时的学生来说还很陌生的专业呢？那要感谢罗定中学的图书馆管理员。她看到我是个乖学生，就给我一些特别的优惠：我可以随意进入藏书库看书。高二之时，她特意介绍我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艾思奇的这本著作，后来虽有不同评价，但当时对于一个好奇的学生来说却觉得打开了一片新的视野：具体学科都只关涉具体领域，哲学作为世界观捕捉着自然与社会的总规则。这诚然能够诱发一个既有志于社会科学，又不愿放弃数理化的

青年学子的喜好。

大学学习的五年，就个人而言，无疑一直是在理想一梦想的照耀下努力付出的年代。

很难说出老师们当时给我们传授的知识对我们此后的治学有多少启示，他们所处的那种政治环境必以意识形态为指引对哲学、哲学史、哲学经典做判释，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合时宜了。但是，前辈老师们传道授业的风采却依旧在我们心中留驻：杨荣国教授、李锦全教授随口征引历史文献的训习，刘嵘教授概括问题显露的才气，罗克汀教授在讲台上不停走动的身影，丁宝兰教授在外观形象上表现的儒雅，陈玉森教授在剖析孔子思想时表现的细密……这些都表明，即便前辈传达的知识技能于今天可能已经被超越，但是作为后辈的我们永远不应该忘却，正是得益于他们的言传身教，我们才得以更上一层楼，有所进步。

在大学期间得益的，还有发现问题的能力与从事理论写作的能力。就当时而言，问题的发现是通过理论与现实的比较、理论与理论的比较，以及理论评价的差异的比较而做出的。只有发现问题，才能有突破性的研究。写作能力的培养，则是通过反复阅读具有典范意义的论作而实现的。逻辑思考习惯奠定了日后严谨的写作方式。不过，那个时代大多青年学子对未来生活的理想和激情并没有因此而被销蚀。记得1965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没有想过要留下来教书，“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首流行歌曲所表达的就是我们当时的真实信念。

后来，我还是留下来了。因为我没有在哪一个学科上表现得特别优秀与执着，于是学校把我安排在哲学教研室，准备教授哲学原理。可惜，我还没有真正走上讲台，“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

三、教学生涯

（一）转向

我真正的教学生涯，是从1977年开始的。也是在这一年，我才进入中国哲学的学科领域。

1965年7月留校，我虽被分配到哲学原理教研室，却为学校宣传部门征用，而后是“文革”，接着是下放到“五七干校”。当时接管学校的

军宣队、工宣队告诉我们，所谓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只需要培养思想宣传员、文艺员；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唯一的出路是“上山下乡”接受改造。中山大学先是选择乐昌的天堂山为干校场地，后来因为山太陡峭，粮油难以为继，1969年春改赴英德虹桥茶场。这一“改造”就是四年。

即便如此，我还是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闲暇时便去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杨宽的《战国史》，还有司马迁的《史记》。这算是与历史沾上边了。

1973年年初，哲学系复办，我被召回。大概系领导看到我什么学科都还没有进入，最好调配，于是让我转入西方哲学教研室。刚刚捧起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史》作哲学史的背景以图有所了解，却又爆发了“批儒评法”的运动。从1973年到1976年，专攻中国哲学史的老师们都得在外面应付宣讲任务，系里的中国哲学史课无人承担，只有转嫁给西方哲学史教研室。我被分派讲授汉唐哲学。大学读本科时，中外哲学史虽都修习两年，可是已经荒废了七八年，如何应付得来？我现在也不知道那时到底讲了些什么。

1976年年底，“四人帮”倒台了，大学回归正常教育。我的西方哲学史还没有起步，且原先只学俄语，做西学难以有成，还不如转入中国哲学。

那一年，我已经36岁了。

（二）初阶

刚刚接触中国哲学的古典文献时，其中许多提法难以理解。例如，《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格物致知”属于认知范畴，“诚意正心”属于修德（价值）范畴，二者是不同的，何以能够连贯起来呢？又且，“修身齐家”成为道德高尚的人，一定就可以做得了“治国平天下”的领导人吗？儒家学者却坚信八个条目是连贯的，那么，我们如何去理解，去说明它们的关联性呢？

又如《老子·三十九章》所说的“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这个“一”是什么？它不是万能的神，却比神还万能？老子的这类话语显然不是胡言乱语，老子的说法被古代人们普遍地接受，显然表明老子与古典社会的思想信念有自己的逻辑。

一门哲学史课，要讲得让学生理解、接受，自当要寻绎出每个哲学家、每个哲学派别以至哲学演变历程固有的内在逻辑。这大概就是我从事哲学史教学与研究的前十年所倾注的努力。

就中国哲学的源头而言，最早最具形上意义的无疑是“帝”的观念。我曾经花去半年的时间研读包括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等一批古文字学家的相关成果。从“帝”的观念的形成看，我们虽然没有足够的材料说明它是殷人祖先神升格的产物，但是，甲骨文的用语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帝令（弗令）某”这样一种语式予以表征。这一语式显示，“帝”对天地万物的管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这很近似于《尚书·盘庚》篇所传达的，殷人对其他部族的绝对统领权。和周人比较，周人以为一个部族之获得或失去统领权，与是否修德有关。这就是说，是有条件的。这已经是“帝（天）为某令（弗令）某”了。这个“为某”，就是指的条件性。有条件意味着，“帝”或“天”是有选择的，“帝”与“天”被理性化了；“帝”或“天”选择的“条件”为“德”，“德”的观念的提出显示“帝”或“天”对各部族是平等的。由是，“帝”或“天”得以脱去祖先神的印记，它与各部族的关系不再是血缘关系，它主持着部族间的公平与正义。就社会历史而言，实际上唯淡化血缘讲求“正义”，才真正踏上文明的通途。而“德”是属于人，由人一主体自己去认定、去修习的。因而，“德”的确立标志着人一主体意识的开启。

思想史的发展踏入春秋时期，随着“德”的观念的进一步提升，相应地便是“帝”“天”地位的下降，出现了人之“德”与“天”之“命”的紧张性。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篇》）孔子的这一说法揭示了这种紧张性。孔子再也无法从“天”“天命”中寻找人道——“仁学”的依据。他与孟子把人道——“仁学”诉诸人的世间情感（不安之心、不忍人之心）；似乎缺失了形上学的支撑，但另一方面却使人一主体的地位得以极大地确立。在主体的内涵进一步往认知方面拓展之后，便有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豪言壮语。至于“天”“天命”，由于不再与价值意识、目的意识相连，则蜕变为一种客观盲目必然性。老子、庄子把它展开，建构为宇宙论。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五章》）所指的即是天地宇宙的客观盲目性。老子进而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所昭示的，则是面对世间功利争夺的无情性与残酷性而不得不讲求的“客观精神”。法家面

对社会人生的残酷无情进而往下拽落，力主严刑峻法。法家把人看作利欲个体，以赏罚为驾驭二柄。此道既不是具形上意义的天道，也不是凸显价值主体的人道。“道”蜕变为手段。手段是暂时的、随机的，无正当性可言。在法家为秦王朝赢得胜利又很快败亡之后，思想家又终于警醒，必须重新寻绎那具有恒久意义的“天道”“人道”及其“相与”关系。于是思想史入汉，翻开了新的一页。

以上所述，是我从最初进入中国哲学史行当，并向 77 级、78 级等各年级同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所追求的严谨性，通过审视各思想家的内在理路、思想流派之间的逻辑关联和哲学思想发展史的逻辑进程，而形成的一种看法。在文献的支持上是否充分、在理论的解释与判释上是否得当，毫无疑问是可以有许多争论的。我自己在后来也有不少看法上的改变。作为审视的角度与方法，那时候我很关切的是如下两点：第一点，不再以四大块（本体论、发展观、认识论、社会历史观）作为框架去肢解思想家的思想体系，而以揭明思想家的问题意识作为逻辑起点。问题意识或源于上一代哲学家、哲学思潮在内在思路上的缺失，或源于社会历史变迁对上一代哲学家、哲学思潮的挑战。下一代哲学家、哲学思潮就从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展开其思想过程。第二点，不侧重于材料的简单罗列与归纳，而更有意于概念的内在结构与演绎。一个思想家在不同意场景会有不同说法，材料的罗列也会肢解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唯有舍弃在个别、偶然场景中的一些说法，才可以演绎出一个思想家符合其运思逻辑的体系来。也许，那些被舍弃的，被认为是个别、偶然的说法，恰恰可能是最有创意、最能构成问题意识的，但它也只是下一代哲学家的起点，还是得被排除在这一代哲学家的体系之外。

这是我入行最初十年围绕教学所做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所得。这份所得，见诸 1989 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的探索与困惑：殷周一魏晋》一书中。该书于 1998 年经修订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易名为《早期中国哲学略论》。

（三）拓展

书名既为《中国哲学的探索与困惑》，并且只涉及殷周一魏晋，自当另有下文。原来的设想无疑是这样。可是一打开佛教的典籍，才知道接下来的工作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由此我想到像胡适那样有学问，何以他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卷上”；冯友兰那样有卓见，何以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涉及佛教其论释亦常常只有寥寥数语。佛学实在名相太多且各宗派说法非常不同。用功两年之后，我仍然没有头绪，只有暂且打住，跳到宋明儒学去。

来到宋明儒学，除了必须面对比先秦两汉多得多的古典文献，还得面对20世纪以来大量的且非常精到的研究成果。如果不能深入地研读别人的著述，很可能自己做的只是重复别人的工作；要都能关涉别人的成果，在时间上又是不允许的。为此，我的研究更多地以冯友兰、侯外庐、牟宗三等前辈和新锐陈来诸家的相关著作为参照系。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吸纳良多，在此无法一一开列。

较之于前人有所不同、自认为有创意的，是我对宋明儒学的分系（派）。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内学者比较认同的说法，是把宋明儒学区分为由张载到王夫之的“气学”、程颐到朱熹的“理学”、陆九渊到王阳明的“心学”三系（派）。我经过研究发现，主“气学”一宇宙论者，便有许多不同。汉唐时期的宇宙论以董仲舒为代表，是直接把价值赋予存在意义，以便通过把价值存在化的方式确保价值的正当性。如董子说“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即是。宋初周敦颐、张载诸子有别。他们并不强调天地宇宙对人的价值信念的给定性。他们确认宇宙世界是客观自然世界，人的价值信念只从人对天地宇宙的敬仰、敬畏与敬祈中成就。张载称“天地则何意于仁？鼓万物而已。圣人则仁尔，此其为能弘道也”（《横渠易说·系辞上》）即是。及清初王夫之，其“气”的概念则更多地不是在化生的“本源”上使用，而是在泛指“存在”的意义上使用。张载是在对天地宇宙生生不息的敬仰、敬畏、敬祈中给出价值信念，带有信仰性。在王夫之严格区分人、物、心、性而一以“心有所取正以为正”（《读四书大全说》卷一《大学》）然后始能成德的功夫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以知识论为基本导向。无疑，在所谓“气学”一系中，张载与王夫之、戴震也有区别。

台湾学者牟宗三对宋明儒学亦做三系判分，不过判分内容和标准与大陆说法大殊。在他看来，第一系为五峰（胡宏）蕺山（刘宗周）系。这一系“客观地讲性体”和“主观地讲心体”，主“以心著性”以明心性为一，为最圆满的一系。第二系为象山（陆九渊）阳明（王守仁）系。

这一系讲“一心之朗现，一心之申展，一心之遍润”，偏重于主体方面。第三系为伊川（程颐）朱子（朱熹）系。这一系讲心、性二分，主、客二分，以性体为“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心则为知识心，在儒学史上实属异出，可称“别子为宗”。^①

牟宗三的这一判断与分析，其精到处随处可见，然其中透露出来的颇令人不满意之点，是牟先生拒绝思想史的立场。从思想史及其变迁的角度看，伊川朱子系将价值客观规则化（理），以确保价值的普遍有效性，象山阳明系将价值收归本心用以凸显价值的主体认信性，其实各自都在把儒学向不同的向度做了展开，从而丰富了儒学的内涵，因此，各自在儒学思想发展史上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而不可轻易予以褒贬。及五峰蕺山系之蕺山刘宗周，已为晚明人物。晚明思想史的变迁以王艮之泰州及其后学为主导，由于在俗世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从而得与社会历史的近代走向相衔接。因之，思想史的研究揭示这一思潮的特质与价值，较之留滞于内在心性的讨论更有意义。可见，宋明儒学的派系与转易，亦有再予讨论的余地。

我的研究试图将宋明儒学因应历史的变迁区分为五系。

第一系以周敦颐、张载为代表。他们力图借宇宙论来证成儒家的价值论（成德论）。儒家的价值论在其创始人孔子、孟子那里，是从世间情感中引申出来与提升起来的，情感为人一主体的。走向宇宙论意味着力图使价值论获得存在论的支撑。存在论取宇宙论为框架，源自农业社会的生存处境与生命体验。在农业社会的生存处境与生命体验中，这种价值意识便具客观普遍意义，但是离开农业社会这种独特条件又将如何呢？

第二系以程颐、朱熹为代表。他们不依托于生命体验，而以认知为入路，借认知方式将儒学的价值信念赋予天地宇宙共相的意义，从而使这种价值信念超越农业社会的特定时空以获得客观普遍绝对必然性，自亦最具普遍有效性。然而，价值毕竟是人一主体认取的，主体到哪里去了？

第三系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他们拒斥程朱的客观化路子而力图将价值意识收归为本心的认取。价值因被赋予信仰的意义而得到极大的提升，主体亦因在价值认取上的自主自决自证性而得到极大的凸显。然而，

^① 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1册），台湾正中书局1987年版，第一部《综论》第一章第四节。